



忠诚稳健 厚积薄发

北宋初年，在人才济济的文臣武将之中，吕余庆并不算是特别耀眼的那颗星，尤其是在跟其弟吕端比较之后。吕端可与大名鼎鼎的诸葛亮亮并名，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”。吕余庆固然不如其弟成就大，名头响，但他却是吕氏家族在整个宋代枝繁叶茂达到鼎盛的重要奠基人。

在吕余庆之前，其祖父吕尧，五代时期官至横海军节度判官，其父吕琦，也为五代时期大臣，先后在后唐、后晋担任诸多要职，史称其“俊美丰仪，颇有气度”“仁厚宽容”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吕余庆耳濡目染，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他不急不躁，步步为营，通过自己过人的聪慧和坚韧，深耕细作，厚积薄发，在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特殊历史时期，牢牢站稳脚跟，并不断成长。

从后晋开始，吕余庆因为父荫顺利步入仕途。他的第一个职位名为“千牛备身”，职责就是陪伴皇帝左右，保护皇帝的安全。虽然该职位起点不是很高，但却十分重要，必须是忠诚可靠、素质过硬的青年才俊才能被授予此任。任职期间，吕余庆心无旁骛，忠于职守，兢兢业业，从无纰漏。由于出色的表现，吕余庆不久就被提拔为开封府参军。开封府参军本是一个伍中的军职，类似于行军参谋，但到了宋代，其职能和权限有所变化，是在开封府任较为基层的行政官员，也算正式步入了北宋官员的行列。

《淮南子》有言，“根深则本固，基美则土宁”，树木的根扎得越深，这棵树就越繁茂；城墙的墙基砌得越好，这堵墙就越坚固。吕余庆根基深厚，起步扎实，自然能经得起时局的变幻与人事更迭的考验，他的稳健、韧性、勤勉、果毅以及只知不说的工作作风，都被人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。所以不久，吕余庆又被提拔重用，担任管理民户、杂役、祠祀、农桑的户曹。后晋少帝的胞弟石重睿兼任忠武军节度使时，对吕余庆非常赏识，请他为幕僚，将“推勾狱讼”——负责刑事与判决的推官之职给了他。

由于吕余庆出色的表现，当时还是地方节度使的赵匡胤非常认可他，不只向周世宗举荐鼎力举荐，还干脆将他一直带在身边做亲信幕僚。宋朝建立伊始，内忧外患，百废待兴，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一大堆，急需得力干将分忧解难。于是，赵匡胤将远在亳州任观察判官的吕余庆召回朝廷，官封给事中，不久，又将首府衙门开封府尹一职给他，意在充分利用吕余庆沉稳和机略的为政作风稳住政权的大本营。

事实证明，吕余庆不负所托，也不负众望，在内部叛乱此起彼伏、外部敌国蠢蠢欲动、风高浪急险象环生的恶劣局面下，他废寝忘食，殚精竭虑，未尝一日得安，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任务，将东京开封府建成了风雨不透的稳固大后方。

公元960年四月，驻守潞州（今山西长治）的悍将李筠打出后周的旗号，公然与赵匡胤决

重厚简易 长者风范

马军

吕余庆，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重要官员，幽州安次（今河北廊坊）人。吕余庆本名为吕胤，为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，故易以其字余庆为名。吕余庆少有大志，聪敏好学，智略过人。他为人疏朗平和，宁静淡泊，为官忠贞不贰，洁如冰雪，重厚简易，才干殊绝，不挣不抢，任劳任怨，颇具长者之风。自后晋入仕之始，吕余庆历任给事中、知开封府、上都副留守、户部侍郎、兵部侍郎、尚书左丞等多职，一直深受信任，宠眷不衰。最后，他在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任上急流勇退，挂冠而去，留下令人赞叹的惊鸿一瞥。

裂，发动叛乱。他联合北汉政权，逮捕北宋朝廷的监军周光逊，派遣军队袭击泽州（今山西晋城），杀掉刺史张福并占领泽州，朝野震动。为鼓舞士气，赵匡胤御驾亲征，在泽州城以南打败李筠的三万主力部队，迫使其自焚而死，晋南叛乱遂平。同年九月，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李重进在扬州举兵反叛，赵匡胤再一次亲率大军征讨。至十一月，宋军攻破扬州，李重进走投无路，举家自焚而死，叛乱平定。在这惊心动魄、血雨腥风的大半年里，吕余庆使出浑身解数上下筹谋、多方运作，令京城民心安定，秩序井然，各项军需物资和粮草给养源源不断运往前方，有力保障了前线平叛的胜利。

菩萨心肠 霹雳手段

经过数年的东征西讨、励精图治，新生的北宋政权逐渐稳固下来。公元965年，赵匡胤终于腾出手来，一举将偏安于大西南的后蜀政权化为历史，并且将亡国之君孟昶押到宋庭。先贤早就认识到，马上得天下，但不能马上治天下，依靠武力征服不难，难的是各得其所长治久安。孟昶这个末代皇帝虽然腐败不堪，但其在蜀地经营多年，思虑故土的吏民大有人在，一旦天下有变，死灰复燃，遍地烽火恐怕是分分钟的事。因此，迅速施行对蜀地的有效治理，安定社会秩序，就成为摆在宋朝君臣面前刻不容缓的一件事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赵匡胤首先想到的就是忠贞不贰、稳健厚重、果决干练、足智多谋的吕余庆。

吕余庆到达成都后，迅速进入角色，他深知摆在他面前的是异常艰难和险恶的环境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酿出大变。朝廷安排的架构是这

样的，吕余庆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，主要负责民政管理。还有一支与他并行的人马，这就是朝廷驻军，负责此地的防务，由王全斌负责，手下还有王仁贍、崔彦进等将领。文武各管一摊，互不节制，这就需要吕余庆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，同时还要协调好与王全斌等宋军的关系，以争得他们的配合与支持。

可是实际情况比吕余庆预想的要糟糕得多。王全斌等一众将领，不仅不能有效节制手下军兵，反而恃功不法，胡作非为，竟然擅自打开后蜀国库，把本该上缴国库的财富肆无忌惮地装进自己的腰包，还纵容属下扰乱市场，强抢民女，“豪夺子女玉帛，及擅发府库，隐没货财”。本来是维护稳定的支柱，却比土匪的破坏性还大。王全斌等人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蜀地民众的强烈不满，域内人心浮动，家家惶恐不安，暴力反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。

可以想象，吕余庆的施政会受到多少掣肘，审时度势在前，深谋远虑在后，吕余庆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：

以菩萨心肠，惠民安民，安抚好蜀地官吏和黎民百姓。吕余庆宣布，蜀地官吏凡是愿意随孟昶入京的，朝廷给他们留出官位，并建好房屋。废除后蜀时期各种烦苛的税赋和杂役，切实减少税役，自965年始，连续四年蜀地夏租减半。降低盐价，确保百姓能够买得起食盐，保障百姓基本生活需求。对于战乱中的盗贼，吕余庆允许他们在一个月之内自首，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
以霹雳手段，猛药治疴，属下官吏借巡查之机寻衅滋事、勒索财物、扰民害民的行为一经发现，则严惩不贷，对驻守宋军擅出军营、危害治安的行为也绝不姑息。一天，某军校趁酒醉之机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持刀抢劫商人财物，此举不只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秩序，也

是对北宋新任知府不遗余力治理蜀地的蔑视和挑战。接到举报后，吕余庆毫不犹豫地立即命人将其逮捕到府衙，当众斩杀。手起刀落，令行禁止，这些平时无法无天的军校们受到极大的震慑，再也不敢随意践踏律法。从此，魑魅胆寒，收手敛迹；百姓安心，五业复兴。

担任成都知府的三年来，吕余庆施政宽简，劝课农桑，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，稳定社会秩序，逐步使满目疮痍的蜀地呈现一派祥和的烟火气。吕余庆的辛勤付出和卓越的治理才干，令蜀地吏民心悦诚服，朝野上下，无不赞叹有加。吕余庆的有效治蜀方略为一众后继者所效仿，这其中就有他的弟弟吕端。

975年，宋朝深陷江南战事，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陷入被动，朝廷决定派使臣稳住北方的契丹，可是却无人愿意出使，因为皆知契丹乃虎狼之邦，杀害使臣之事屡屡发生。就在这一僵持阶段，吕余庆举荐不避亲疏，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吕端。很多人都不以为然，认为吕端不过是一酒囊饭袋，干不了什么事。赵匡胤因为无人可派，只好同意任用吕端。吕端在一片质疑声中出使契丹，凭着满腹经纶，处变不惊，折服契丹君臣，最终不辱使命凯旋，令满朝文武刮目相看。不久，吕端升任知成都府，他的施政风格极其类似吕余庆，深得蜀地吏民之心。

胸有丘壑 淡泊名利

吕余庆外表疏阔平和，水波不兴，内里则是胸有丘壑，智略过人，因此，年纪轻轻的他就已颇具实力，极具名声的幕僚了，就连当时的周世宗举荐吕余庆都有深刻的印象，任他为掌书记。北宋建立之后，原后周宰相范质为赵匡

诗人们的冬至情怀

王利娟

冬至，是二十四节气里的一个重要节气，这一天，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祭祖节日，所以，古代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讲法。在这个重要日子里，无数文人墨客把自己人生的感悟，写入一首首经典的冬至诗词中。

白居易笔下的冬至是思家的。他在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中写道：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冬至这天，漂泊在外的诗人，正好夜宿邯郸驿舍。他看着处处家人团聚、欢声笑语、节日庆祝的热闹景象，而自己形单影只，只有孤灯相伴，倍感凄凉。诗人此刻十分想念家人，可他偏偏不说自己想念家人，而是说家人应该直往夜深，还围坐在灯前，思念着自己这个远行人吧。真可谓无一字提“思家”，处处含思家之情。

陆游笔下的冬至是孤独的。宋宁宗嘉泰元年（1201），七十七岁的陆游，已经离开官场回到了山阴老家生活。这年冬至，他看着冷冷清清的冬至，写下了《辛酉冬至》：“今日日南至，吾门方寂然。家贫过节，身老怯增年。毕祭皆扶拜，分盘独早眠。惟应探春梦，已绕镜湖边。”诗中的“日南至”即是指冬至。诗人虽然为官多年，可惜一直不得重用，所以积蓄不多，家境颇为贫寒。到了冬至，也不能像别人家一样隆重地庆祝，只能“轻过节”。再想到自己年事已高，每到冬至就又将再添一岁，更是让人感慨时光易逝，岁月蹉跎。诗人用“分盘独早眠”来描写自己过冬至早早睡去的情景，和周围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孤独感更甚。

苏轼笔下的冬至是超凡脱俗的。“井底微阳回未回，萧萧雨湿茱萸。何人更似苏夫子，不是花时肯独来。”苏轼在《冬至日独游吉祥寺》里记录了自己冬至游吉祥寺的感怀。吉祥寺，是宋代名刹，因牡丹而闻名。花开时节，文人墨客纷纷前往赏花作赋，无比热闹。而此时，正值冬季，虽然已到冬至，但微阳未回，再加上寒雨萧萧，备受大家瞩目的牡丹也只有“枯萼”。清冷的寺中，也许只有苏轼这样超凡脱俗、特立独行之人才会到访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，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风采。

范成大笔下的冬至是充满希望的。“寒谷春生，熏叶气、玉笋吹谷。新阳后、便占新岁，吉云清穆。”诗人在《满江红·冬至》中开篇即用冬至的典型特征来表明节气变化。冬至是太阳“日行南至，往北复返”的转折点，此后太阳高度回升，进入了新的循环，也常被作为代表着新的一年开始。此时，“冬至阳生”，春意也开始萌动。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，诗人号召大家“休把心机关药裹，但逢节序添诗轴”，即使现在是在强颜欢笑，想想未来，依然是充满希望。

虽然随着时间的变迁，冬至不再如古代那样重要，但品读这些“冬至”诗，感受穿越时光的“冬至”，依然能体会到古人的冬至情怀。

滴水成海 聚沙成塔

王爱军

象，不久就会有祸难发生，到那时再请各位共同完成大业吧！”说完，当即只带了几个随从，便赶赴京城了。

果然，刘或没有为难他，任命他为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

三

刘或死后，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了当皇帝的心，带数万精兵奔袭建康，都城一片惊慌。萧道成力主抵抗，在都城的外围新亭构筑工事。战事进行得非常惨烈，叛军一度攻到城下。刘休范战死，他手下的典签为制造混乱，诈称刘休范已攻占新亭。在那种形势下，跑得最快的可能就是谣言了，城内的人士官吏、商贾百姓，为了保全性命，或是争相抢先站队，纷纷跑到新亭的军前投上名片，表达效忠之意。

望着眼前成堆的名片，萧道成的手下很高兴，毕竟人海茫茫，找出谁是奸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现在他们自投罗网，自然不能轻易放过。萧道成摇头说，“大难临头，怕死不过是人的天性，不必过于追究。”他命令把这些名片全部烧掉，然后列队登上城头，对那些投奔来的人说：“刘休范父子前日已被杀死，尸体就在南冈下。我便是萧道成，各位好好看看。你们递上来的名片我都烧掉了，不必担心。”

众人一听，吓得脸都变了色，可看到自己投上来的名片真的化成了灰烬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战事获得了胜利，萧道成率领车队凯旋，沿途百姓夹道欢迎，议论说：“正是这位大人保全了国家啊！”

四

荆州刺史沈攸之反叛，朝中重臣袁粲等都参与了谋划。袁粲的典签莫朝祖事先知道了他们的阴谋，但没有主动举报。萧道成得知后，把莫朝祖召到了自己的帐前。他口气严肃地质问道：

“袁粲谋反，你为什么来不报告？”莫朝祖神色淡然，平静地回答说：“服侍主人，义无二心，即使死也不敢出卖主人。”

萧道成不禁点头称赞，当即赦免了他的罪过，将其官复原职。

将军黄回驻后新亭，听到石头城那边战事打响，便率兵过来协助袁粲。朱雀桥有守军，命令他返回驻地，按照职级，黄回应受节度，他也没听，带领部队连夜开到了石头城下，可等他到了那里，叛乱早已平定了。

黄回很尴尬，便谎称是赶来平叛的。其实萧道成早就知道他已与袁粲勾结的事实，可他并没有当面揭穿，而是对他加以安抚，继续让他担任将军之职，并且派他西上与叛军交战。

黄回感激之情溢于言表，与萧道成道别时，更是不由得流下了眼泪。

五

萧道成很有才华，尤其擅长书法和围棋。

他对自己的书法水平很是自负，有一次，他在朝堂上与南齐著名的书法家王僧虔比试书法，两人各书了一幅字后，萧道成问王僧虔说：“朕与公卿书法，谁是第一？”王僧虔从容回答说：“臣书第一，陛下亦第一；臣书为群臣中第一，陛下为帝王中第一。”萧道成听了，哈哈大笑。

萧道成还酷爱下棋，他玩什么都很投入，曾有二卷本《齐高棋图》问世，足见其围棋水平。有一天，他召直阁将军周覆、给事中褚思庄进宫陪他下棋。与周覆对弈，二人杀得难解难分，有一个劫争难住了萧道成，他陷入了沉思。一会儿，他若有所思地拿起棋子，放在了棋盘上，几乎是同时，他又突然意识到不妥，立刻拿了起来。此刻周将军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棋盘呢，一见皇帝悔棋，不干了，情急之下，把抓住了萧道成的手，要把那粒棋子抢出来。旁边侍立的臣子们吓坏了，马上大声喝止周覆，随即要求给周覆个大不敬之罪，杀了他以儆效尤。萧道成笑着摆手，“玩儿罢了，怎么能当真！”

在历史的转折关头，似乎人人都面临着机遇，但结果却常常令我们失望，于是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，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？人们常说，一粒沙里藏着一个世界，一滴水里折射出一片海洋，萧道成能从一个普通人走上皇帝的高位，或许答案就在这些细节当中。

语词精奥

“男女授受不亲”是怎样演变的

许晖

男女授受不亲，授，给予；受，接受；不亲，男女之手不能接触。这句话的本义是男女之间不能手递手地传递东西。

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语出自《礼记·坊记》：“子云：‘好德如好色。诸侯不下渔色。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。男女授受不亲。’”

孔子在《论语·子罕》篇中说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，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就像爱好美丽一样的人；诸侯不下渔色，诸侯如果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娶妻妾，譬如渔人撒网捕鱼，网中的鱼当然全部归属渔人所有，因此要对国君的这种特权加以限制，只能娶别的女人的女人；因此君子要远离美色，以此作为人民的准则。

前三句中都有一个“色”字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要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生怕男人被女人之“色”所惑。这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的礼制写照。

关于“授受不亲”，《礼记·内则》中还有具体的规定：“非祭非丧，不相授器。其相授，则女受以篚，其无篚，则皆坐奠之，而后取之。”“篚”是圆形的盛物竹器。除了庄严的祭祀和合便的丧葬等场合之外，男女之间如果相授东西，女方必须用篚承接，如果没有篚，那么双方都要坐下，把东西放到地上，然后女方才能取走。

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非常苛刻的规定，甚至一家之中，男女都不能杂坐在一起，不能把衣服挂在同一个衣架上，不能使用同一套盥洗用具，女子出嫁后回家，兄弟不得与之同席而坐，同器而食。

但是，同样是儒家宗师，对于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苛刻规定，孟子却有不同意见，《离娄上》一篇中记载了他和淳于髡的一段对话。

淳于髡曰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与？”孟子曰：“礼也。”曰：“嫂溺，则援之以手乎？”曰：“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权也。”

孟子认为“男女授受不亲”固然是礼的要求，但是嫂子溺水的时候必须援之以手，否则就是豺狼。这是对于礼的“权”（变通）。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，孟子的思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但是到了后世，尤其是宋代理学之后，“男女授受不亲”发展到了变态的地步，与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一样成为吃人礼教的代名词。